

《東華漢學》第 14 期；21-54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1 年 12 月

漢魏六朝行記三類兩體敘論

李德輝*

【摘要】**

行記是一種來歷久遠的史部著述，同時也是一種獨特的散文文類。它起源於漢魏，初盛於六朝隋唐，繼盛於宋元明清，千餘年來，作者蔚起，代有新變。漢魏六朝作為其孕育和初創時代，其文獻學基礎和文學研究的基礎都相當薄弱，其間究竟出現了哪些類別、體式，各體有何特點，與後世的遊記有何異同，均不甚清楚，急需解決。若從文獻考證和文體辨析入手，似可回答上述問題。按照內容的不同，可將其劃分為外國行記、行役記、交聘記三大類別。根據編撰方式的不同，又可將其區分為行傳體和筆記體兩體。此三類兩體行記在內容、體例、寫法上各具體色，但又有著最基本的文體特徵和演變規律。

關鍵詞：漢魏六朝、行記、類別、行傳體、筆記體

* 湖南科技大學「湖南省中國古代文學與社會文化研究基地」教授

**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唐前文館及其與文學和政治之關係研究」（10BZW041）成果。

一、漢魏六朝行記的文獻性質與類別劃分

行記是旅行記的簡稱，專門記錄古人的出門遠行。其名最初見於《隋書》卷三九〈經籍志二〉地理類，其中著錄佚名《江表行記》、姚最《序行記》、佚名《魏聘使行記》、《李諧行記》、李繪《封君義行記》、薛泰《輿駕東行記》等六書，皆名「行記」，後世又衍生出行錄、遊記、驛路記、行程錄、行部志、道里記等變種。從現存文獻出發考察，它原是漢魏時期出現的一種內容偏於山川地理、行程見聞的地理學著述，屬古地學之支脈。紀行之外，常以簡練文筆反映各地山川風物、土地人民，為人們研究古代社會歷史文化提供了依據，歷來被視為珍貴史料，《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將其著錄在史部地理類。但它常以第一或三人稱口氣記述旅人經見，抒發個人感觸，有時還表達見解，穿插故事，兼用描寫議論抒情文筆，包含人物傳記和遊記要素，帶有文學意味，故它同時還是一類文學作品。只因多數行記文學性不強，而為今日的文學研究者所不齒，不願將其納入文學研究視野。而從史料學和文體學的角度考慮則又不然，漢魏六朝行記年代久遠，存世稀少，加之又是初創階段，其史料價值更在唐宋之上。從文學發展的角度看，它屬於古代傳記文學、行旅文學中的一個異類，又可納入今人所說的紀實文學範疇，豐富了古代文學的內容，在文體學史和散文史上都佔有不容忽視的地位，沒有理由棄置不顧。

由於上述原因，古行記的文學研究長期以來處在邊緣化的狀態，鮮見有人問津，學術投入欠缺，積累的成果以史學研究和文字校釋為主，可供利用的文學成果不多，¹直到近二十年局面才有所改觀，兩岸三地

¹ 專門的對古行記研究學術史的回顧，牽涉面太廣，非本文所能勝任。僅以唐前古行記的研究而論，單《法顯傳》、《宋雲行記》等名作的研究，成果即有一大堆；若再以學術選題分列，則所涉文獻量更大，扼要羅列都會

的學者陸續參與進來，但是真正從文學立場出發的正面研究仍然不多見，與楚辭漢賦、唐詩宋詞、明清小說等主流文學的研究相比仍然不成比例，反差強烈，一些文獻學層面和文體學層面的基本問題至今仍未解決，僅以本文所論的漢魏六朝而論，問題就有不少，如可考的行記都有哪些？有哪些類別和體式？怎樣對它們進行科學分類？各體行記在內容和形式上有何特點？都無現成答案。筆者研究古行記有年，特撰此文，嘗試對唐前古行記做一總賬式研究，回答上述問題。

漢魏六朝行記在內容上的顯著特徵是兼綜百科，邊界模糊。此間行記多出中外使節、遊方僧人、南北聘使、文學侍臣之手，多言山川地理、佛教流傳、異域風情，兼具外國傳、僧傳和異物志性質，與僧傳、方志和風土類地記的界線尤其不清晰，讀者可根據自己的知識背景，對所見行記有不同的理解，很難取得共同的認識。儘管從理論上說，行記自當以紀行為主，但事實上有不少作品，對山川地理和見聞的重視反倒超過了對行程本身的記錄，沿途經見、個人感受備錄無餘，行程路線反倒時隱時現，若有若無，致使敘行的主線淹沒在對山川風俗的載錄上，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它紀行的特色，模糊了它以行為本的性質，有時甚至看不清它是否為紀行之書，導致著述體裁的誤認。我們的行記研究，因此常面臨尷尬處境，至今尚乏有效對策。

不僅如此，行記邊界模糊的文獻特徵還給我們的研究造成了理論上的困難，表現最突出的就是分類問題。古人對行記性質的認識是模糊的，對它的歸類也很混亂。《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將其視為地理書，著錄在史部地理類，《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等又分別收入史部雜史類、偽史類、傳記類，將其當作雜史、偽史、傳記看待，與以前目錄的歸類大相逕庭，令讀者無所適從。雖然各有依據，但都未抓住其作為紀行著述的根本點。至南宋鄭樵《通志·藝文略》，才開始打破

有一大片，佔去很大篇幅，喧賓奪主。為避繁冗，本文改在第五部分以研究類型為準，做了挂一漏萬式的回顧和前瞻，讀者鑒之。

這一局面。鄭氏發揚傳統目錄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精神，細緻區分古地學書之流別，把行記從龐雜的古地理書中剝離出來，當作專門的紀行之書，單列成類。鄭氏還將所見漢唐兩宋行記細分為朝聘、行役、蠻夷三個亞類，提出了三分法，照顧了不同行旅的文化背景，有助把握其內容特色。他的這些工作體現出會通意識和創新精神，自成體系，非常可貴，值得尊重。但其分類標準未能劃一：朝聘兼顧了作者身份，行役考慮到行旅性質，²蠻夷又是據經行地域，所分三類根據的是三重標準，內涵上互有交叉，其劃分並不太科學，具體的作品歸類也未盡當，個別的書名、作者還存在誤判，所以其分法仍不具備可行性，歸類也不盡可據，問題仍未徹底解決。鄭樵以後，行記的目錄學研究一直停滯不前，沿襲故態。現代學者對此並不熱心，間或有人涉足其間，亦多是從文史考證入手，把它當成一種有特色的史料；或視為一種古代遊記，納入遊記體散文視角加以探討，並沒有很多人把它當作一類有獨立價值的紀行文學對待。

考慮到以上因素，本文從時代最古的漢魏六朝行記入手，做一分類研究和文體學研究。在分類標準上嚴格堅持以作品內容為準，將其區分為三類：記域外行程、由遊方僧人、外國使臣創作的遊方出使記，稱「外國行記」；南北朝聘使編撰的交聘行記，參考鄭樵的命名，稱「交聘行記」；其他記述此間文人行役的一般作品，則統稱「行役記」。外國行記的特色在於專載旅行者的域外行程，一般從出境時寫起，到回程時為止，較少涉及國內，主要講的是僧人在西域南海的巡禮求法，或中國官員的外國使程。交聘行記主要寫南北政權交聘的經歷，所寫路線皆在南北兩朝的都城之間，不涉及其他。文人行役記所寫總在國境以內，具體的地域和路線會隨人隨事而變。可見這三類行記涉及的是完全不同的三個境域、三類事件，雖同記古人遠行，但在地理空間、題材內容、事件

² 按，「行役」一詞原指服兵役、服勞役或因公務出外跋涉，專指因公出行，不涉私行。後世文獻中的行役轉而泛指出門遠行、長途跋涉，與古詩文中的「行旅」一詞義近。鄭氏這裡所謂行役亦指此義。

性質上却是互異的，具有獨立性的，不存在大面積交叉重疊的現象，三者界限分明，一看便知，對其內涵做一番釐析不是什麼難事。而搞清楚這個，也十分有利於分類研究和文體研究的開展，同時還有助於讀者對本文內容的理解和接受。下面搜括文獻，逐一考察這三類行記的興起背景、體式內容和文獻存佚，然後辨其文體，論其特色。辨體的標誌有四：（1）書名中帶有經、行、遊、歷、征等表示遠行的字眼，能提示作品內容。（2）公私書目有著錄，其他文獻有稱引；或雖無著錄但有佚文傳世，可證其為紀行著述；（3）所寫之事必須是長距離旅行，短途的不出境的山水轉悠不算。（4）必須是以紀行為主，忽視行程、只重遊賞的不算。本文就根據以上四條來判斷其是否為行記。

二、行記的來歷及內涵上的規定性

行記是從古地理書中派生的，論性質屬古地學之一類。追查它最早的來歷，當緣於漢魏古人的地理行遊。但是周秦時就已有古地理書了，像《穆天子傳》也被認為是紀行之書，裡面也有對行程、方位、風土的記載，《山海經》採用的也是依照地理方位記載的方式。儘管它們不是紀行的專書，所寫的旅行也不一定都是實錄，但其依方位移動來雜記山川方物的敘述模式，對後世地理書的編撰依然是有啟發的，漢代桑欽的《水經》便是這樣的著作。漢代文人出使外國，即模仿這種方式來條述使程，雜記地理，最古的行記即由此而出。至於魏晉，又從中派生出僧人行記和文臣行記，分別記述僧人的游方求法、文臣的隨從征行，行記大家族的三個主要成員至此齊備，古地理書也完成了從一般地紀載地理到專門的記述行程這樣一個轉變，經過前人不斷的探索，至於東晉，行記文體終於趨向定型，產生了成批著述，在目錄學上可以單獨成類了。

但是細心體察會發現，行記一詞的含義，原有廣狹、古今的不同。狹義的行記是指古書書名中帶有「記」字的、以筆記體寫成的旅行記錄。

這個「記」字來自古代書志中著錄的書名，是一個文獻類別名，一個文獻學概念，有二義：一指作者紀行的方式，一指該書紀行的文體。今人則通常用作辨別文體的標誌。書名作「記」，意為不拘體例，隨事記錄，與今人理解的筆記義近。廣義的行記則是一個現代概念，通常被用作古人旅行紀錄的總稱，並無文體的界限和內容的分別。今人所說的行記就是指這個，它與隋唐書志中的所謂行記名同實異，是對古行記概念的借用，而在具體的對象上由單純的記體之書擴大到古代各種旅行記錄，包蘊較廣，一般不再去細究其原始含義。本文除討論專門的「記」體行記時使用狹義概念以外，其餘均遵學界通習，稱古人旅行著述為行記。

一般意義上的所謂行記，其內涵至少具有下面四個規定性：其一，有一個中心事件——一個人或一群人的某次出門遠行，書中所寫的一切，都是作者的沿途所得，都有遠行的事件作背景。其二，這個背景，同時還作為作品的敘述框架而存在，作者是在紀行這一框架下記地理的，作者通常就是旅行的親歷者和行記的持筆者，他是以「我手寫我身」。其三，遠行的事件背後，還站立著一個故事的講述人，書中也有旅行的主人公，寫成的書具有敘事作品的色彩和性質，這就與一般的地學書在性質上有了較大的區別。作者撰述此書，意在以書來傳事，以事來存人，使當世之人和後世之人，都知道歷史上還曾有過這樣一個人、這麼一件事，而不是像地志的編者那樣來平面客觀地記述一國一地的地理。作為古地理書，當然也有保存資料、擴展知識的作用，但這在當時不是第一位的。其四，所寫都是作者行跡所至，考察所得，來源於作者長期、深入、廣泛的實地踏勘，在內容上具有徵實的特點和考信的品格，不像《山海經》、《穆天子傳》那樣，儘管也有行程方位的敘述，但不是旅行實錄，材料來源不是靠的旅行，而是後人彙編資料、附益傳說成書，難以徵實，更不具有敘事作品的性質。像《大唐西域記》、《徐霞客遊記》，即是作者艱苦卓絕的地理實踐的結果，是通過實地考察得來的，內容要比起那些承襲前人、泛寫地理的書真實、詳盡、可靠得多，也要科學、寶貴得多。只是各人的寫作目的、才性氣質不同，對材料的

取捨、編錄的方式會有差別：有的重在記列道路，指導遠行，因此將對路線、行程的翔實記錄放在了首位，寫成的書多為游方傳、使程記、行程錄。有的重在採錄沿途見聞，認為自己的遊蹤不是很重要，因此在表達上並不刻意追求行程的清晰、內容的連貫，而是隨得隨寫，體制較散，因為這一點，故沿用一般的概念，稱之為「××行記」。這個「記」字，有表明體例、提示文體的作用和意思，對讀者辨認文體也有助益，不宜與廣義的行記概念混為一談。

我們通常所說的行記，在內容和體例上便具有上述特徵，正是這些特徵將它和其他的地理書區別開來，自成一系。下面的論述，就將根據上述的界說展開。

三、外國行記的興起與行傳體的確立

與以抒情為主的詩詞不同，行記是一種紀實性著述，是基於古人出門遠行這一基本事實，沒有這個就沒有行記的誕生。因此研究行記的起源，首先就得追溯相關的歷史背景。

從時代上看，最先問世的是外國行記，即記述古人在西域、中亞、南海等域外行程經見的作品，作者為漢魏陳隋使臣、僧人。因所述均先唐境外古國殊域之事，內容奇絕，而有著特殊史料價值，吸引眾多史地學者投身探研。使用的名稱則未統一，或稱「外國傳志」，如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或稱「古西行記」，如楊建新《古西行記選注》。但此類作品並非盡述西行，內容也并非全是外國，而是從境內敘起，詳外略內，故這兩個名稱都不能包括全體。湯老的命名儘管有科學性，但他並不是專門針對行記來說的，而是從佛教史入手的，範圍太寬，類別未明，性質未彰，故還須做進一步限定。現在結合湯、楊二家所說，略加變更，改稱「外國行記」，就名實相符，包舉大端了。

最初的外國行記出自漢代使臣之手，其興起的背景可追溯到漢代的外交通使活動。西漢武帝時，嘗遣張騫出使西域。此後的兩漢王朝，與西域、南海通使不絕，使節或自河西走廊出，或自滇藏出，事蹟具載於漢魏六朝史乘、子書。這些活動留下的旅行作品今天者可考者為《張騫出關志》，作者係晉宋間佚名文人，採摭張騫出關的文獻，與漢魏兩晉民間傳聞拼合而成。書名作「張騫出關志」，意思是關於西漢人張騫西出陽關、遠使西域的旅行記錄，乃晉宋文人追記張騫出關、遠使西域之事，非張騫自述行程經見之書。張騫兩次出使西域，原來應撰有出使紀錄，作為其奉使遠國回朝的交代。其書可能為司馬遷接觸到，故將其部分採入《史記·大宛列傳》當中，但經太史公改編，已非原貌，晉唐載籍亦未見記載，顯已失傳，只剩下《張騫出關志》這個晉宋文人的改編本。《隋書·經籍志二》著錄，一卷；亦見《通志·藝文略四》，居行役類作品之首，表明該書的外國行記性質。³其書六朝隋唐時行世，崔

³ 宋·鄭樵，《通志·藝文略四》「地里·行役」類首列此書，他顯然是把書名當成張騫《出關志》，視為漢人張騫作的一種時代最古的行役類地學書。但《隋書·經籍志》將其放在釋曇宗《京師寺塔記》、釋曇景《外國傳》二書之間，夾在南北朝作者佛教地理著述當中，題《張騫出關志》，非張騫《出關志》，可見是南朝劉宋時人所作，非出漢代使臣之手。《隋志》著錄古籍，一般按時代先後，據作者身份排列，很少例外；前面先以大字正文列出書名、卷數，下面再以小字注明作者。根據這些著錄體例，我們也可斷定其非西漢著述。今本《隋志》「張騫出關志」這一書名下並未注出撰人，表明編者已不能考知。唐宋文獻所記亦可證明這點。《太平廣記》卷四〇七「藤實杯」條引《炙轂子》：「藤實杯出西域……不傳於中土。張騫入宛，得之，事在《張騫出關志》。」便是一例。有關張騫出關西行的見聞，最早見《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司馬遷在傳文開頭即載明：「大宛之跡，見自張騫。」這裡的「張騫」不僅指的張氏本人，還兼指他歸國後所獻的旅行記錄，說明它是司馬遷修〈大宛列傳〉的重要史源。但這並不表明，司馬遷依據的就是張騫的《出關志》，很可能另有其書。只能說，《史記》中有關西域的國情資料，多得自探險家張騫的兩次西行報告。然而現在有些書籍，徑直把《史記·大宛列傳》的前半部分改稱張騫《出關記》，實在有欠妥當。此書下傳到齊梁唐代，唐道宣《釋迦方志》卷下《遊履篇第五》搜括傳記，概述漢唐間人西遊事蹟，首舉張騫。《玉海》有徵引，書名作「張騫海外異記」，理解為張騫所著的海外述異記，又生一層誤解。

豹《古今注》、《後漢書·西域傳》、《冊府元龜》卷五六〇、《太平廣記》卷四〇七、《太平御覽》卷九九五各有徵引。《玉海》卷一六將其與東方朔《十洲記》、楊孚《異物志》等並列，顯示該書紀行之外，還兼具地理書和異物志性質。儘管內容玄虛荒渺，寫法不倫不類，文體未純，但出使外國、撰寫傳記的做法却是一種極富開創性之舉。後世的西行者正是仿效張騫等人的做法，回國之後多「別立傳記」。張騫之後，東漢之世，又有班超、班勇父子，相繼出使西域，《後漢書》卷四七保存有相關資料。班超的出使紀錄不見徵引。班勇之書，則《後漢書》卷八八〈西域傳〉有引用，引文前面交代說：「班固記諸國風土人俗，皆已詳備《前書》，今撰建武以後其事異於先者，以為〈西域傳〉，皆安帝末班勇所記云。」⁴下面的引文保存了班勇著作的大部，記述西域疆域四至、交通都城、人口歷史、物產風俗，究其實質為漢代方志，只是兼記行程，帶有行記色彩，如：「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國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國南行度河，又西南至於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⁵因內容主要為殊域風土，後世或題《西域風土記》。

嬗遞至於魏晉，外國行記的創作主體改由僧人充當。其興起的背景是晉宋間的西行求法運動。此時佛教已深入中華文化，南北帝王大都崇信佛教，竭力扶持，民間的信徒更多，佛教得到很大發展，名僧輩出，寺院眾多。佛教雖已有了堅實基礎，但經典仍不夠，理論仍未備，需要繼續搜尋、充實。僧侶、信徒或為搜尋經典戒律，或欲從高僧受學，或欲瞻覽聖蹟，紛紛前往西域，人數眾多，可考的也有數十。但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其旅行多半途而止，未能如願，僅少數人親臨天竺。倖存的西行者回國後都撰書紀行。當時數量可觀，寫法各異。梁代僧人僧祐、慧皎，唐代僧人道世、道宣等都見過很多遊方僧的傳錄，單《釋迦

⁴ 劉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八七，〈西域傳〉，頁 2912-2913。

⁵ 同前註，頁 2918。

方志》卷下就列出八種，其餘散見於梁慧皎《高僧傳》、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唐道宣《大唐內典錄》、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靖邁《古今譯經圖紀》、智昇《開元釋教錄》等的，亦復不少。除僧人外，奉使外國的官員也有撰寫，可見當時外國行記的編撰頗成風氣。

《隋書·經籍志》地理類凡著錄外國行記十一種，皆載中華人士遊行西域天竺南海事。它們是：

《佛國記》一卷，題「沙門釋法顯撰」，知係法顯自撰行程之原作。《隋志二》雜傳類又著錄有《法顯傳》二卷、《法顯行傳》一卷，均無撰人。湯用彤、章巽認為《隋志》以下著錄的二卷本《法顯傳》係後人對法顯原作的加工，非法顯自述行程之作，一卷本的《法顯行傳》才是法顯自撰。智猛《遊行外國傳》一卷，《出三藏記集》卷一五、《高僧傳》卷三、《開元釋教錄》卷四下各有引錄，行程清晰，經歷完整，保持了原作的的基本輪廓。曇景《外國傳》五卷，載其東晉時遊行西域經歷。《慧生行傳》一卷，北魏僧慧生撰，一名《惠生使西域傳》。亦見《大正藏》第51冊No. 2086，書名改題作《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記》。其梗概附載於《洛陽伽藍記》卷五，與他書混編，原貌盡失，唐李延壽著《北史》亦曾採用，引文記述行程，屬行記體。《伽藍記》作者楊銜之還在引文結尾交代說：「《惠生行記》事多不盡錄，今依《道榮傳》、《宋雲家記》，故並載之，以備缺文。」⁶可見他只摘錄了一部分，還做了改寫。法盛《歷國傳》二卷，兩《唐志》著錄，其書隋唐間有數本流傳。《通典》卷一九一引作《歷諸國傳》，稱之為遊歷傳記，顯示該書的行記性質。《西域道里記》三卷，闕撰人名；亦見《新唐書·藝文志二》，作程士章撰。士章當為隋人，時代與常駿、裴矩相近，嘗奉命出使外國，或因他事經行西域，因得著此書，以紀道里經見。《大隋翻經婆羅門法師外國傳》五卷，《通典》卷一九一有引述，視為遊歷傳記，題《翻經法師外國傳》。《隋志二》另有《林邑國記》一卷、《交州以南外國傳》

⁶ 周祖謨，《洛陽伽藍記校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卷五，頁224。

一卷、《諸蕃國記》十七卷，原文多佚，其書體例已難考明，但從其排列位置和前後著作性質看，則可判定其具有紀行性質。梁啟超《佛學研究十八篇》考出先唐僧人行記十一種，部分係據書名推測，其中某些書是否為行記，還須求得進一步的佐證，否則只能存疑。

以上為《隋志》著錄者，其不見於《隋志》者更多，現在搜集文獻，分類考述如下。

第一大類：僧人行記十三種。時代最早的為燉煌沙門竺法護《西遊三十六國記》，記其西晉武帝泰始年間西游歷程，原書不存，書名為筆者權擬。次有西晉高僧釋道安《西域志》，其性質與法顯《歷遊天竺記》、支僧載《外國事》相同，為諸僧遊歷傳。原書宋以前即亡，《水經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有引錄。宋雲《魏國已西十一國事》一卷，《舊唐書·經籍志上》、《新唐書·藝文志二》著錄，今人楊建新《古西行記選注》改題《宋雲行記》。《洛陽伽藍記》卷五引錄，但與《惠生行記》、《宋雲家記》、《道榮傳》三書混編，三者關係如何，是否同書異名或內容互見，學界並無定論，目前已難確考。寶雲《外國傳記》，載其晉隆安初遠適西域事。據載，其「所造外國，別有記傳」⁷，且有劉宋時人雷次宗撰序，今均亡。幽州沙門曇無竭，劉宋時遊歷天竺南海，也曾別撰記，述其所歷事蹟，但隋唐書志均無著錄，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題作《歷國傳記》。劉宋沙門道普、北魏沙門道藥都撰有行記，道普之書《釋迦方志》卷下提及，稱「別有大傳」⁸，似部頭不小，惟未著書名，湯老題作《遊履異域傳》。道藥為北魏太武帝時僧人，其行記《洛陽伽藍記》卷五引作《道榮傳》，周祖謨《洛陽伽藍記校注》指出，榮為藥之誤，書中的「道榮」就是道藥。《釋迦方志》卷

⁷ 梁·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一五，〈寶雲法師傳〉，頁579。

⁸ 唐·道宣，《釋迦方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下，〈遊履篇第五〉，頁98。

下提到此書，稱「著傳一卷」⁹。南齊沙門僧寶《游方沙門傳》，專記宋齊沙門遊方弘法之事，地域上並無中外之別，¹⁰見《高僧傳》卷一四，從書名看，可能編綴了不少沙門游方之事，所記非止一人，體例跟那種以一個僧人遊歷事蹟為主的行傳似略有區別。又《通典》卷一九一引錄支僧載《外國事》、曇勇《外國傳》、支曇諦《烏山銘》，此三書據杜佑講，均屬晉宋間「諸僧遊歷傳記」，¹¹然不見於隋唐書志。支僧載《外國事》記西域遊履見聞，《水經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都有引用。曇勇《外國傳》又見《廣川書跋》卷四、《路史》卷三。《隋書·經籍志二》著錄曇景《外國傳》五卷，此曇勇或即《隋書·經籍志》之曇景。支曇諦為晉宋間人，其《烏山銘》《太平御覽》卷五〇題作《靈鳥山銘》，載西域靈蹤聖跡，成書年代無考。《水經注》卷一、《通典》卷一九三多次引到竺法維《佛國記》，從引文看亦屬僧人行記。北魏沙門菩提拔陀《南海行記》，載其北魏末年遊歷南海諸國經見，其書《隋書·經籍志》以下均不見著錄，《洛陽伽藍記》卷四永明寺條下有節錄。

第二大類：中國使臣所撰外國行記八種。依時代先後，最早的作品當推西漢初年陸賈的《南越行紀》，記陸賈出使南越的道途經見，但《漢書·陸賈傳》及《漢書·藝文志》均不載，他書亦少見徵引，唯西晉嵇含《南方草木狀》引述一條，記南越境內五穀花木，看不出任何紀行特色，多稱其地人民物產之異，反倒很像是嶺南風土異物志，其書來歷不無疑點，頗似後世文人偽托。但陸賈當年出使南越，撰有使程記，則必無疑義，今《史記》卷九七、《漢書》卷四三〈陸賈傳〉、《漢書》卷九五〈南粵傳〉記其南越使事，文筆詳贍，繪聲繪色，多有人物對話等細節，體近小說，所據或即陸賈的使程報告。其次有東漢明帝永平三年郎中蔡愔、博士秦景等《天竺行記》，載其一行從雪山南頭到印度，圖

⁹ 唐·道宣，《釋迦方志》，頁98。

¹⁰ 對此書概況的考述，見劉綱，〈《高僧傳》序錄所論四本書考〉，《中國文化研究》第1期（2007.1）。

¹¹ 唐·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一九一，頁5199。

佛像，訪佛法事，原書不存。第三為成光子所作《行傳》。其人具體事蹟無考，漢獻帝建安十年（205），他奉秦州刺史之命西行，從烏鼠山度鐵橋而入，窮於達嘍，旋歸之日，「自出別傳」。¹²《董琬行記》，北魏太武帝時人董琬作。其人太武帝太延二年（436）前後為散騎侍郎。這年冬十一月，受魏王之遣，與高明等人多齎金帛，出使西域，招撫九國。行至烏孫、破落那，與國王結好。旁國聞之，爭遣使者隨琬等入貢，凡十六國。董琬西使，原撰有行記，但《隋書·經籍志》以下不見著錄，《魏書》及《北史·西域傳》、《通典》卷一九一均有轉錄，而以《魏書》採錄最豐，可予輯復。裴矩《高麗風俗》一卷，記其大業中從煬帝征伐所見高麗的道途山川風俗，《舊唐書·經籍志上》著錄。裴矩《隋西域圖》三卷，大業二年後不久撰。大業二年，西域諸國至張掖交市，煬帝令矩護視。乃訪諸商胡國俗山川險易，撰成此書，合四十四國。別造地圖，還而奏之。常駿《赤土國記》二卷，見《舊唐書·經籍志上》、《新唐書·藝文志二》。據《隋書·南蠻傳》，常駿係隋屯田主事，大業三年（607）奉煬帝命，與虞部主事王君政等出使赤土國，歸國後撰寫此記。今亡，《隋書》卷八二、《北史》卷九五〈赤土國傳〉、《通典》卷一八八有引錄。韋節《西蕃記》，《通典》卷一九三引錄。韋節係隋代使臣，煬帝時官侍御史，與司隸從事杜行滿奉使西蕃諸國，得舞女、寶物而還。大業六年（610），煬帝將西狩，命節以侍御史出使西突厥，召處羅可汗與帝車駕相會。隋末動亂，入王世充部為長史、內史。唐高祖武德四年（621），世充兵敗，韋節被俘，後不知所終。生平見《隋書》卷八三〈西域傳〉、卷八四〈突厥傳〉、卷八五〈王（世）充傳〉、《資治通鑑》卷一八一、一八七、一八九。所著《西蕃記》《隋書·經籍志》以下不見著錄，惟杜佑《通典》稱引兩次，後之諸書引文皆襲《通典》。

¹² 唐·道宣，《釋迦方志》，頁97。

以上共考出先唐外國行記二十一種，都屬行記史上的初期作品。從內容和體例看，是古代傳記與其他史部著述的一種雜交，其性質是「行傳」，即以傳記體寫成的專門講述一個人或一群人行程經見的著述。這從文獻稱謂上也看出。北魏僧人慧生撰寫的行記，《隋書·經籍志》題作《慧生行傳》。唐初王玄策出使中天竺所撰行記，《法苑珠林》題《西國行傳》。玄奘西遊之書，今題《大唐西域記》，《法苑珠林》則都作「奘法師行傳」或「奘法師傳」。此外還有稱「傳」或「記傳」的，如僧人道藥的行記作《道藥傳》，法顯行記在《魏書·釋老志》中被稱作「所逕諸國傳記」，《開元釋教錄》卷三則題「歷遊天竺記傳」，總之都不離行和傳二字，以行字表明內容，傳字標示體裁，表明此類書的「行傳」性質，也顯示了出行和立傳的內在聯繫，說明凡是重要的遠行如遊履西域，必有人出來為之立傳，這在六朝隋唐乃是一個傳統。

從現存史料看，行傳起源於漢魏之際，最早的成型作品為前文提到的成光子所撰《行傳》，此前則一直處於未定型狀態。我們看到，漢代人撰寫的域外行記如班勇《西域風土記》，兼具風土記、異物志和行程錄特色，在此數種著述之間擺動，說明它還未能獨立成體，人們還處在摸索之中，撰寫時可以有多種選擇，魏晉之際始趨於定型。此後，晉宋間出現了法顯《歷遊天竺記傳》、《宋雲行紀》、《惠生行傳》等專門記述僧人遠行之書，南齊沙門僧寶亦撰有《遊方沙門傳》，僧人行記至此成體，其正式的名稱應當是「行傳」，即記載旅行經歷的傳記，其特點是通過敘事來寫人，人的活動經歷是內容的中心，行程見聞是書的重點，寫作時注重事件的連貫性、經歷的完整性。至於人們感興趣的殊域風土、珍異見聞，雖然很吸引人，但在行傳中始終都只能是附載，而不可能居於作品的中心，這是因為作品的中心始終是人而不是事。最初成光子等人撰寫的西行傳記可能就是如此形態，他們這批人就是行傳的初創者，以後更形成一種傳統。法顯、宋雲、惠生、僧寶等晉宋齊梁間人，則是這一傳統的弘揚者和行傳的定型者。

在佛教文獻和佛教目錄中，行傳又被視為僧傳的一個品種，書的作者和主人公都是游方僧。《高僧傳》卷一四〈序錄〉：「自漢之梁，紀曆彌遠。世涉六代，年將五百……眾家記錄，敘載各異。沙門法濟，偏敘高逸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僧寶，止命遊方一科……並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¹³所謂「遊方一科」即遊方僧旅行傳記，以遊行路線、佛教內容為重點，有別於其他。《高僧傳》卷三〈宋京兆釋智猛傳〉就說：「余歷尋遊方沙門記列道路，時或不同，佛鉢頂骨，處亦乖爽，將知遊往天竺，非止一路。」¹⁴類似這種「記列道路」的僧傳亦屬「遊方一科」，具有行傳性質，是不可多得的漢文佛教史傳。

行傳的主要職能體現在兩方面：一是記列道路，為後續而至的行人提供參考；二是備述見聞，增進人們對外地和外國的瞭解，一般各地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面貌、宗教流傳等方面都會講到。用今天的學術眼光看，涵蓋的學科領域多達十幾個，內容相當寬廣，記事十分浮泛，而行程、見聞則是它的兩個基本點。社會史料豐富，文風古質，皆實地踏勘所得，可信度高，是它們的共同特點和優點，不足則是文筆過簡，內容過實，文學意味過淡。

從文學本位出發看，行傳體融合了傳記和遊記的文體要素及著述特點，具有此兩種文體的優長：它像史傳那樣集中講述一個人的生平和特點，據作者實地踏勘所得資料寫成，有傳記那樣完整的人物經歷，有遊記那種異域風光，傳記的作者通常就是傳記的主人公。作者意欲借此使其事蹟得以流傳。在敘事中寫人，在寫景中抒情。既能體現作者之情性，也能反映世界之豐富，主觀和客觀達到一種平衡。由於有貫穿始終的中心人物和故事情節，有立體的敘事框架，因此其結構是立體的。其組織材料的方式是線性的縱貫式，不是網狀的平行式。除人物事件的敘述不能過於隨意以外，其它如遊蹤、見聞和觀感都是可強可略、靈活多樣的。如果行蹤被視為第一位，那見聞和觀感就會被忽略，對行程路線和重要

¹³ 梁·釋慧皎，《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一四，頁523。

¹⁴ 同前註，頁126。

景點的記錄會居於作品的中心位置，這樣寫成的東西就會是一種平實客觀的紀錄，缺少傳記文學跌宕起伏、平中見奇的韻味；反之，如果見聞被視為最重要，那遊蹤就只能被淡化，作者本人也不能過於突出。這時候，寫成的作品因為看不到中心人物和主要事件，內容不連貫，線索不清楚，記事不明晰，就會像是風土記或地方志。這麼寫，知識性當然會很豐富，文學性則會十分貧弱。在作品中時隱時現的交代行蹤之筆有可能被讀者忽視，變得無足輕重。如果作品再經他人刪述，則更看不到原貌，不知原書性質。最後，如果作者經歷、路線行程、外地見聞一個不拉，都想突出，那寫成的行記就是標準的傳記加遊記：有對事件的客觀闡述，有域外見聞的真實記錄，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寫照，有遊記的宏偉結構和規模氣勢，有文士之詞筆，有學人之智識。作者一般不杜撰材料，所寫總有依據。但因融合了多元化文體要素，在藝術處理上往往十分自由，風格常因作者才性而異：可以寫得像流水賬那樣質木無文，了無生氣，也可以像小說和抒情文那樣奇情壯采，引人入勝。著名的《大唐西域記》就是這樣的書，而以法顯《佛國記》為發端，此書開始顯露出這樣的特點。單純突出遊蹤和見聞的，或因文筆過於平直，辭采過於枯淡，或因內容散亂無序，文學性都天然地不足，不能傳之久遠，在我國古史上都逃不脫被摘錄、改編、刪述的命運，存傳佚文所剩無幾。唯獨傳記體行記能取長補短，歷久彌新，魅力永恆。但真正的好作品古往今來都沒有幾部，可見此種境界實難達到。

四、行役記、交聘記的繁榮與筆記體的流行

漢魏六朝，緊承外國行記之後而起的是行役記。它所涉及的行役範圍既不在蠻夷外國，也不在周邊民族，而在中國境內，記述的是六朝文人從駕、出征等公行和私行。清人章宗源、姚振宗兩種《隋書經籍志考

證》都對此作過考證，所得不一。現在結合諸家所考，考明此類行記成書於晉宋間的，有十種：

郭緣生《述征記》二卷、《續述征記》若干卷。據《冊府元龜》卷五五五，郭緣生為晉末宋初人，晉宋之際曾從劉裕北伐慕容超，西征姚泓，入宋以後撰寫行記，述其前後從征見聞，因名《述征記》、《續述征記》。同類書又有戴延之《西征記》，二卷。據《隋書·經籍志二》小注及《封氏聞見記》卷七「蜀無兔鴿」條，延之，本名祚，字延之，江東人，嘗任晉西戎主簿。義熙中充劉裕軍府僚屬，預西征之役，因撰此記。《水經注》卷十五所載亦可證實這點：「義熙中，劉公西入長安，舟師所屆，次於洛陽，命參軍戴延之與府舍人虞道元，即舟溯流，窮覽洛川，欲知水軍可至之處。延之屆此而返，竟不達其源也。」¹⁵《宋武北征記》一卷，《隋志》作「戴氏撰」，據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及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三四，此戴氏即戴祚，嘗從劉裕北伐慕容超。這次北征，除戴延之之外，還有裴松之、孟奧、伏滔、徐齊民等四人，都撰有《北征記》。同類著述另有伍緝之《從征記》，丘淵之《征齊道里記》、裴松之《述征記》，分述其從軍征行事。裴氏書一名《西征記》，《太平寰宇記》卷一二引有一條，記河南亳州老子宮雙柏，而年代晚至隋大業十三年和唐武德二年，與裴松之生平明顯不合。撰人《寰宇記》庫本作桓裴之，不知是否為裴松之誤。其書亦罕見稱引，內容不無疑點。孟奧、徐齊民，事蹟不詳。伍緝之據《隋書·經籍志四》，劉宋時奉朝請，有《伍緝之集》十二卷。丘淵之即丘深之，晉宋間吳興烏程人，位至侍中、都官尚書。段國《沙州記》，雜記晉宋間沙州一帶山川地理，而以作者行程為線索，涉及臨洮、燉煌、白蘭、女國、吐谷渾、可蘭國等政權部落，兼記該地河流、城池、關津、橋梁、動物、植物，多朔漠風情，還有三危山、西王母樗蒲山、鳥鼠同穴等古遠的傳聞，以及東漢以來漢羌戰事、風俗物產、民居部落，內容龐雜，《水經注》、《北堂

¹⁵ 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一五，頁365。

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通鑑釋文辨誤》等各有徵引。

齊梁周隋間的行役記，則有以下十二種：宋沈懷文《隨王入沔記》六卷，載其從隨郡王劉誕入襄陽事。元嘉二十六年（450），宋文帝欲大舉北伐，以襄陽為基地，命其第六子雍州都督劉誕主持其事，時沈懷文跟隨隨王劉誕至襄陽，撰此記，敘述隨王劉誕自南徐州（唐潤州，今鎮江）徙鎮襄陽的征行經歷。梁薛泰《輿駕東行記》一卷，載梁武帝東幸事，《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二〉著錄，題《輿駕東幸記》。據姚振宗考證，事在梁大同十年（544）春夏間。薛泰是武帝的扈從文臣。從《太平寰宇記》中引文看，所記行役範圍在唐潤州一帶，並不遠。梁吳均《入東記》，成書於梁天監二年（503），記其在湖州一帶的遊歷經見，成書以後不甚流行，《隋書·經籍志》以下不見著錄，《太平寰宇記》、《大清一統志》、《浙江通志》、《永樂大典》等引有多條。孫景安《征途記》，記其北魏宣武帝時受命按獄、奉使關隴之經見，《通典》、《長安志》各有引錄。北周姚最《序行記》，載周武帝攻齊之事。周建德五年（576）冬，周武帝舉兵東伐，以齊王憲等為前軍，時姚最在齊王府中為水曹參軍，掌記室事，從行征齊，撰此記。此書《隋書·經籍志》著錄，十卷，至兩《唐志》則僅剩二卷，殘軼大半。據《周書》卷四七〈姚僧垣傳〉，姚最之父姚僧垣亦好文史，「撰《行記》三卷，行於世」¹⁶。結合《周書》本傳考察，此書似是載其建德間扈從周武帝東伐經歷。僧垣書僅三卷，姚最書則十卷，顯係另一書。隋諸葛穎《北伐記》七卷，載其大業初從煬帝北巡，討伐吐谷渾事；《巡撫揚州記》七卷，載其仁壽時隨楊廣巡撫東南的經過，¹⁷《舊唐書》卷四六〈經籍

¹⁶ 唐·令狐德棻，《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頁844。

¹⁷ 《隋書》，卷七六、《北史》，卷八三，〈諸葛穎傳〉作《鑾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書名、卷數都與《隋志》、兩《唐志》所載不合。從書名看，《北伐記》與《鑾駕北巡記》，《巡撫揚州記》與《幸江都道里記》所記為同一事，疑當時二本並行，書名各異，《隋書》紀、傳各取其一，故有這種差異。

志上〉作《巡總揚州記》，撰人譌作諸葛穎。《隋書》卷七七〈崔廓傳〉載，廓子蹟大業八年前後，曾參加遼東戰役，奉詔作《東征記》，所記當為其從駕東征行程見聞。《太平寰宇記》等又引有盧思道《西征記》，其行程路線在宋汴一帶。又王應麟《玉海》卷一五謂《廟記》也是述征行之書，此書《隋志》、兩《唐志》著錄，一卷，不知何氏作。而從存留的佚文看則不像是行記，倒像是專記塚墓的雜著。¹⁸時代最晚者為蔡允恭《并州入朝道里記》一卷。允恭，江陵人，初仕於隋。入唐，太宗引為秦府參軍兼文學館學士。貞觀初卒。從這段經歷看，題中的「入朝」似指作者隋末唐初由太原入長安。因以記赴新朝道里見聞為主，故名《并州入朝道里記》。《舊唐書》卷一九〇上本傳謂其「有集十卷」，但不載其撰有此書。對此，清人姚振宗解釋說：「此書不載者，似已編入本集十卷中也。」可備一說。

以上為時代基本可定者，另有屈璆《道里記》。其人生卒年里、具體事蹟無考，嘗遊歷嶺南，並撰此書以述道里見聞，然自《隋書·經籍

¹⁸ 按，梁·吳均亦著有《廟記》十卷，與本書同名，然乃另一書。考《玉海》（揚州廣陵書社，據清光緒九年浙江書局刊本影印，2007），卷一五，頁292「唐地理六十三家」條云：《新唐書·藝文志》「史錄十三曰地理類……（其中）地圖則有……地志則有……術（述）山川則有……述異物則有……述征行則有《廟記》《輿駕東幸》《循撫揚州》《西征》《述征》《述行》《入河》《聘使行記》及《聖賢冢墓》之記。」知該書內容為記述征行，文體上屬於行記。該書《隋書·經籍志二》、《舊唐書·經籍志上》「地理類」各有著錄，均一卷。亦見《新志》，在薛泰《輿駕東幸記》之前，似作者亦為梁人，時代尚在薛泰以前。梁吳均所撰的《廟記》則非一卷，而是十卷，其書《隋志》即不見著錄，是成書不久即亡，《隋志》、兩《唐志》所著錄、六朝唐宋典籍所徵引者，斷非此書，而是《玉海》所說的述征行的《廟記》。今存於《三輔黃圖》、前四史古注等書中的佚名《廟記》佚文多達三十餘條，皆記故都長安的門闕樓臺、宮殿池苑、宗廟陵墓，著重寫關內古蹟，作者顯然為北朝人士，熟悉當地山川，故因某次出使遠行，搜括為記。吳均則為梁人，世仕江南，生前又無北使的經歷，無緣得見北朝的山川古蹟，其書何能言長安故蹟。吳均之書長達十卷，佚名的《廟記》則僅一卷，是二書條目內容、傳本卷數都不同，顯然為不同作者撰寫的兩種同名著作，不宜混為一談。

志》以下均不見著錄，《通典》、《初學記》則引有二條，不能考明其具體時代，只能根據文獻記載略知其為六朝文人行記。

《隋書·經籍志二》另有謝靈運《遊名山志》一卷、李彤《聖賢冢墓記》一卷，居晉宋行記之首，當為紀行著作，所記為文人私行。謝靈運之書，《四庫全書總目·徐霞客遊記提要》認為是「品題名勝」、「託興登臨」，作於「典午而後，遊跡始盛」¹⁹的背景下，反映的是六朝文士吟賞煙霞、品題泉石、範水模山之癖。從今存於《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中的佚文看，確實如此，範圍不出山水名勝。《初學記》卷五還保存了該著的序文，開頭即稱：「夫衣食生之所資，山水性之所適，今滯所資之累，擁其所適之性耳……豈以名利之場，賢於清曠之域耶？」²⁰將個人志趣表露無遺。李彤在謝靈運之後，其書鄴道元《水經注》有徵引，知為劉宋時人。其書詳細考證歷代陵墓、故實，於州縣城池、方隅道里皆備志之，開創了一種紀述行程加史地考證的獨特體例。今《太平寰宇記》、《太平御覽》、《長安志》還有引文，所記均關內、河南一帶地理、行跡，時代自孔子以下名賢至於漢晉歷代帝王，史料價值高，亦有文筆。

合計以上先唐古人所撰公私兩類文人旅行紀錄，共二十四種。從今存的引文看，不少作品記述詳細，文風誇飾，卷數在三卷以上，篇幅相應增加，有別於外國行記的質樸與簡單。

東晉以來，我國南北各地先後出現許多政權，它們都經歷了由對立走向通和的過程，交聘則是實現和解、維繫穩定的主要手段，我們所說的第三類行記——交聘記則是這些政治外交活動的副產品。它們原是南北雙方遣使交聘的記錄，出交聘使節之手。根據內容的不同，可細分為北使聘南和南與南使聘北兩小類。其中北使聘南的有四種：《魏聘使行

¹⁹ 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七一，〈徐霞客遊記提要〉，頁630。

²⁰ 唐·徐堅等，《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五，引劉宋·謝靈運〈遊名山志序〉，頁94。

記》六卷。據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此書與《李諧行記》、《封君義行記》三書原為一書，均出北朝聘使李繪之手，記其父子兄弟相繼出使梁朝事。李繪，北齊人，父渾，兄弟湛、繪、偉，都曾聘梁。李繪著書，記其出使經見，後佚。佚名《江表行記》一卷，載其出使江南的行程見聞，《太平寰宇記》等書有引文。敘說南使入北的也有四種：江德藻《聘北道里記》三卷、劉師知《聘遊記》三卷，記二人陳天嘉中出使北齊的經歷。江氏書在《陳書》本傳中題作《北征道理（里）記》，《隋書·經籍志》改題今名。姚察《西聘道里記》一卷，載其使隋事。《陳書》本傳兩次提及，先是稱此書「所敘事甚詳」，後又謂其所著「《西聘》、《玉璽》、《建康三鍾》等記各一卷，悉窮該博」²¹，然《隋志》即已不載，疑唐初已亡。《隋書·經籍志二》又著錄《朝覲記》六卷，無撰人，在《李諧行記》、《聘遊記》、《封君義行記》三書間，既居北使聘南的作品系列，似亦屬此類。

與僧人行記的撰寫不同，南北交聘是在國家層面、政治體制下進行的，有明確的制度保障和規矩約束，行程路線、往返行期、出行人員、禮儀程式都是基本固定的，不能隨意更改；言語舉動代表國家，不能隨便，這就不同於僧人的巡禮求法，是一種個人選擇和自發行為，做與不做，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往返行期、遊歷範圍都因人而異；旅途言語舉動有充分的自由，可以盡顯個性。其時「交聘」包括國家、民族和地區三個層次，三者之中，又以中國中央王朝與對立政權交聘為主，中外交聘為輔。作為維繫和平的重要手段，交聘涉及當時諸多國家、政權間的複雜關係，是當時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得到普遍重視。大概自三國後期起，交聘就加密，趨向制度化。晉宋之際，南北交往愈密，開始妥協結盟，加強互動，聘使活躍起來。東晉義熙十三年（417）以後，南北政權更是「使命歲通」²²。齊梁陳隋，儘管時有戰爭，但還是

²¹ 唐·姚思廉，《陳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卷二七，〈姚察傳〉，頁349、354。

²² 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九五，〈索虜傳〉，頁2322。

沒有成為主流，雙方依然通好不絕。《南齊書》卷五七〈魏虜傳〉：「宋明帝末年，始與虜和好。元徽、昇明之世，虜使歲通。」²³既是「歲通」，次數必多。據《冊府元龜》卷一四二〈帝王部·和好〉，從黃初二年（221）吳魏交聘始，至隋平陳前的開皇八年（588），367年間雙方共通聘、來賀123次。這麼多次，留下的行記僅寥寥數種，每書僅有佚文數條，還是因為出自南北朝著名文士之手才得以保存下來，與歷史記載的交聘盛況形成強烈的反差，其間遺漏的史事必有不少。²⁴

南北朝外交使節的行進路線，總在南北兩國首都之間，具體地點和走向因時而異。北魏前後期是在平城—建康或洛陽—建康，東魏、北齊、西魏和隋的交聘則分別在鄴都—建康、長安—建康。後梁政權定都江陵，其與魏交聘路線變為江陵—鄴城。略去這些細微區別，取六朝南北交聘主線做一概述，則基本路線為平城、鄴都—黃河北岸—建康，或建康—洛陽—長安。南北朝初期，使節一般從平城南下到黃河北岸，或取雁門關路，沿汾河南下；或自平城向東南，經莎泉、靈丘抵中山，沿太行山東麓驛路南。後期則由鄴都、洛陽、長安出發，由滑臺、碭礪、兗城、徐州、武州、宿豫、淮陰、廣陵而達建康。²⁵東晉南北朝三百年來，很多使節長年奔走在這些道路間，寫下記行之作。在朝或群臣聚會，賦詩送別，沿途則登山臨水，寫景抒情，都不乏文學活動，只是其所撰述久佚，無從查考。當時南北雙方都十分重視交聘，精擇聘使。《北史·李諧傳》稱：「初通梁國，妙簡行人……既南北通好，務以俊乂相矜，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梁使每入，鄴下為之傾動。」²⁶南

²³ 梁·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卷五七，頁986。

²⁴ 近年，歷史學家黎虎主持有2005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漢唐『交聘』體制研究」，此前又有《漢唐外交制度史》（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98），皆為本文重要參照。

²⁵ 本段對六朝聘使交聘路線的概述，參見遼耀東，《北魏與南朝對峙期間的外交關係》（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1）。前田正名，《平城歷史地理學研究》（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臺北：中央研究院史語言研究所，1985），第五卷河東河北區。

²⁶ 唐·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四三，頁1604。

朝也是精選才學之士以為行人。聘使代表的是國家形象，選擇要求很高，一般選擇門第、才望、人品俱佳者充任。李湛、李繪一家為北齊高門，四代聘梁。封述為北齊文臣，老於經史。天平中，奉命以兼通直郎使梁。江德藻、劉師知、姚察等也是文史兼優的傑出人物，他們的出身、修養和個人好尚決定了其作品風格有異於僧人行記的質樸和簡古。

以上共考出行役記二十四種，交聘記八種，原書均亡，現存的都是經六朝唐宋文人摘錄的佚文，散在諸書，原貌盡失。若從這些佚文判斷，極易將其誤認作記載山川水土的地志，其實不然。細加尋求，仍可發現原作紀行的痕跡。

首先是書名的提示性。上引二十多部書，書名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都有經、行、征、遊、記、志等字，以此表示內容；又以記、志二字，標明體裁。合起來看，則那些書都是以散筆紀行之書，必可斷定。

其次是引文的指向性。上引眾書雖然多已亡佚，但是還有少量佚文存世。憑著這少量佚文，我們也可以推見到全體。酈道元《水經注》箋釋關內、河南水道時，採用晉宋文人行記最多。引文時代早，錯誤少，最可憑信，我們就來看看此書的引文。《水經注》卷四引《西征記》：「沿路透迤，入函道六里，有舊城。城周百餘步，北臨大河，南對高山。」²⁷卷一六引戴延之《西征記》：「次至白超壘，去函谷十五里，築壘當大道，左右有山夾立，相去百餘步。」²⁸兩段引文，分別以「沿」、「入」、「次」等字表述行程，組織材料。透過這些隻言片語，仍可考見原書紀行的性質和體例，只因經過刪節，不易發現其為紀行之書。

第三是後人的引述，亦為我們考見原書體例提供了旁證。王應麟《玉海》卷一五縱論隋唐地理諸家，談到《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中，述征行則有《廟記》、《輿駕東幸》、《循撫揚州》、《西征》、《述征》、《述行》、《入沔》、《聘使行記》及

²⁷ 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一五，頁109。

²⁸ 同前註，第389頁。

《聖賢塚墓》等記，明確指出其述征行的性質與內容，《四庫全書·徐霞客遊記提要》還將謝靈運《遊名山志》、戴祚《西征記》、郭緣生《述征記》、姚最《述行記》與《徐霞客遊記》並舉，視為同類著述，其為行記無疑。

上述行役記和交聘記運用的體式不是行傳體，而是筆記體。這是一種別出於行傳體之外的紀行文體，其一般寫法是以行程為線索，選擇經行區域中的若干地點做對象，分條記載，後面附載以當地神話、民間傳聞，內在地包含著「紀行文字+景點記述+民間傳說」的敘述結構。因是隨事記錄的隨筆文字，內容互異，就不像傳記體行記——行傳那樣中心明確，結構緊湊，經歷完整，內容連貫，語氣暢達，而是恰恰相反：沒有完整的人物行程經歷，一事一條，結構散漫，無連貫性，不像行程記，倒像風土記。很顯然，作者是把重點放在了風土上，而不是行程上。作為一種著述，其體例特點是「行記的體式+地志的內容+詞章家的文筆」，即以詞章家的文筆敘地理風土，以行程串聯材料，以地志的編排方式分列條目。這種體式在南北朝文人的同類著述中普遍存在，說明當時頗為通行，此間文人撰述交聘、行役記時所樂於採用。

從文學本位出發看，筆記體行記的文學性最為令人失望：它的組織行文最為隨意，文字是條目式的，一事一條，沒有形象刻畫和中心事件，沒有場面描寫和人物對話，不能展露作者的心靈世界，讀者只能跟隨作者，去感受他曾歷的境界。作者不是按照事情發展順序來佈局，而是按照空間位置來安排，章法散亂，呈現網狀，看上去很像是地理總志和地方志中對一州一縣山川風物的載錄。持之以與《太平寰宇記》、《岳陽風土記》等書比照，發現除了地志分立門目載錄山川，筆記體行記無門目、隨行蹤記山川以外，其餘都頗相似。偶爾出現的對外地傳說、軼聞的記錄，又在疑似之間，不能取信於人。間或為之的文學誇張和辭藻修飾，又與整體的平直散漫風格不太協調。總之，整體上看，篇體和文情都大異於傳記體行記，文學性缺失，知識性和趣味性却不乏。作者本人一般不直接出現，而是退到幕後，記山川風土、異聞掌故，其實際意義

僅相當於今天的攝像頭，作者所要做的只是把事象如實描摹給讀者，整部作品缺乏靈魂和神氣，可讀性不強。作者觀察事物的眼光亦十分怪異：既不純是地理學家、文獻學者的考求實證眼光，也不全是漢唐小說家的搜奇志怪眼光，更不是明清遊記作家常持的山水審美眼光，而是這三者的複合。所寫或可資學術考證，或可作增廣見聞。內容雖然廣博，但沒有科學精神作指導，帶有隨意性，水準參差不齊。做得好的，還能體現求真務實精神，派上文史考據用場；做得差的，往往時有差謬，遭到指斥和輕視。晉宋文人郭緣生、戴延之等人編撰的行記，便因為不夠嚴謹務實，所寫與實際不符甚至出入較大，而遭到學者指摘。其書寫成後數十年，即被學者酈道元在《水經注》中一再指斥，駁正多達十數條。大概六朝文人都有尚奇尚異特點，尚乏清及近代學者的樸學精神和學人理性，自難對遊履區域做完全客觀如實的記錄，經不起實踐檢驗和學術審查，在地理方位、路線行程、山川景物的記錄上常與實際不符。

當然，這些批評都是站在今天的立場上發出的，而六朝文人撰作的筆記體行記卻都是時代的產物、歷史的印記，自不可能符合今人的學術標準，滿足今人的學術期待，因此也就無足深責，要在客觀公正對待。而且，以聯繫和發展的眼光看，筆記體行記的上述特色也反映了早期行記內容的變動不居和體制的遊移演變，可見出一時代之風氣，故在行記發展史和散文史上還是應佔一席之地。

五、行傳體、筆記體的區別、聯繫及各自的寫法分析

行傳體和筆記體一為傳，一為記，原屬不同紀行文類，自有其區別在。關於這一點，前人說得很明白。《四庫全書總目》：「傳記者，總名也。類而別之，則敘一人之始末者，為傳之屬；敘一事之始末者，為

記之屬。」²⁹可見其最根本的區別是一主於人物事蹟，一主於事象羅列，因此文體風格各異。主事蹟的敘述連貫，主事象的內容鬆散，給人的感覺很不一樣。下面舉二例為證。

從此西行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度葱嶺。葱嶺冬夏有雪，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度嶺已，到北天竺。始入其境，有一小國名陀歷，亦有眾僧，皆小乘學……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嶮，崖岸嶮絕，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³⁰

檀山凡去洛城水道五百三十里，由新安、澠池、宜陽、三樂。三樂男女老劣，未嘗見舡，既聞晉使溯流，皆相引，蟻聚川側，俯仰傾笑。³¹

兩段引文記述方式的共同點是都以地點為中心，方位為次序，里程為連接，以此方式去顯示地點景物間的關聯，每一地點之下扼要記述山川、風俗、人群和傳說。不同點在於第一段屬記列行程式，以出行日期為序，逐一記錄行蹤見聞，多用記事、狀景兩種文筆陳述描繪，這樣可清楚地反映出行者的閱歷和心態，第二段則是散記方土式，雖然也以地理方位為序，但只截取遊行經歷的片段，並不全面鋪寫，重點偏向經行地點的山川風物，間或運用狀景、摹物方法，反映某一特別的細節。這樣可把經行地域的地理特點、景觀面貌反映出來，人的活動則退到後面，個人經歷被掩蓋。

但行傳體和筆記體畢竟都屬行記，文體性質和寫法仍具有相通性。從文體學角度看，外國行記是受史傳文學影響而產生的一種「記傳」，是一種融合了傳記敘事寫人兩方面技巧、帶有傳記講述人物故事性質、而以敘事為主的著述。從內容上看，無論是西行求法還是出使外國，都

²⁹ 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五七，頁531。

³⁰ 章巽，《法顯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21-22。

³¹ 宋·李昉，《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七七〇，引戴延之〈西征記〉，頁3413。

是以一個人物為中心，記其一生中一段特殊經歷，時間、地點、人物、事件、場面、環境等敘事要素一應俱全。說它特殊，是因為所經皆絕境，所見皆異聞，中華士人所不至不睹，故不能不在傳記體裁中兼用筆記體式，選擇性地把重要內容記載下來，存傳後世。因為內容獨特，在史志中被視為內容相對獨立的類別而單獨編錄。根據以上理由，可以認為這類行記是敘事作品，具有敘事作品的內容、形式上的要素，從而有別於一般地理書與抒情作品。以人物活動為中心，以行蹤為線索，講述其奇絕經歷，好像述說一個長長的故事，雖無敘事詩之情節，但作品中一段一段的行程經見，正可視為情節。

外國行記的寫法也很能說明問題。這類行記最重視的是對旅行這件事情本身的敘述，因此有較強的客觀性，作者一般不作過多的主觀發揮，而重在遵循寫實原則，對所獲資料做準確記載，文風嚴謹。主要借助傳統的傳記體裁來講述行程經見，既「傳」人又「傳」事；「傳」是它的體式，「行」是它的內容。這種體式的形成，主要取決於古代落後的交通狀況，取決於六朝時人記列道路的現實需要。那時的古人出遠門，路況原始，翻山越嶺，餐風露宿，異常辛苦。前進途中，路線走向、乾糧飲水、藥材器具、語言交流，無一不是困難。此外還有毒蟲猛獸、險峻山川，無一不威脅人的生命。那時沒有大馬路，沒有路標，沒有地圖，前行路線全靠旅行者本人去尋找辨認。至於像中亞、天竺之類行人稀少的絕域，更是連交通路線都未明確，不固定，得靠探險者自己去摸索，一般的中土士人都沒去過。行記的作者作為異鄉人，當然也不認得路。大體上說，對於一條陌生道路，一靠當地嚮導指引，由他們領送出境；二靠前行者留下的印記，或憑藉過路動物的腳印，乃至路上留下的人骨、動物骨和牛馬糞便作指引；三靠當時及前輩旅行文書中留下的對交通路線的記載，以此作為依憑。行傳對旅行者的指導作用，正體現在這一點上。對於六朝僧侶和使臣來說，往返中國和西域之間，海陸行程動輒上萬里甚至數萬里，往往數年甚至十多年，都在路上度過，處在長途跋涉之中。對他們來說，旅行就不是今天這樣的生活當中的小小插

曲、短暫時光，而是一種長期存在的生活方式，一種重要的社會行為，本身就有探險和創造的價值。更不是一種審美過程，不像今天的旅遊，通過飛機、高鐵行進，以機器代步，體驗愉快，過程短暫，主要時間都在景點度過，旅途伴隨著對風景的發現、閱歷的豐富、美感的形成，唯獨缺少跋涉的艱辛。中國古人都安土重遷，最怕出門遠行，不像西方人那樣大膽，充滿探索欲望和勇氣。很多讀書人平時都足不出戶，習慣於靜養安居，對於遠行和異鄉天然地有著莫名的恐懼。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們還敢於冒風險，暴霜露，做前無古人的艱辛探索，其精神尤為卓絕。

這種行傳與漢魏六朝一些史部著述有著密切聯繫。漢魏六朝時期史學發展最快，三百年間，湧現出許多新體式，行傳這一體式便孕育和成長在這種活躍的環境中，受到過不少史書的影響。與它最接近的著述樣式是紀傳體中的外國傳和僧傳。但是一加比較，立刻就可發現行傳的獨特之處：外國傳雖敘地理風土，但並不以人物為中心，也沒有中心事件，只扼要對外國情況做客觀概述，文字是介紹式的，平面的。僧傳雖以人物為中心，也有事件和情節，但並不以「行」為主要事件，敘述的是全人全體，而不是某人的一段經歷，難免平均使用力量，故大多數僧傳裡都看不到對行程的細緻記述。行傳則不然，它雖也寫人，但採用的是立體的故事構架，只集中筆墨講述主人公的一段行歷，載其行旅路線和途中見聞，重點突出，線索分明。可它分明又是一種傳記。這樣的特點使得它既有異於以往的任何史傳，又能充分吸納傳統傳記既長於寫人又便於敘事的特長，有著很大的自由發揮的空間，記敘、描寫、議論、抒情都可運用自如。

外國行記的傳記性質，還鮮明地體現在某些著述名稱的變化上。如《法顯傳》，章巽《法顯傳校注序》考出法顯傳、法顯行傳、佛國記、佛遊天竺記、歷遊天竺記傳、佛遊天竺記、釋法顯遊天竺記、天竺國記等十多個名稱，其中都有記、紀、傳三個字，以此作為文體標誌，³²可見其紀行為主的行傳性質。

³² 章巽，《法顯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5-8。

總之，無論從著述要素、著作職能看，還是從著作淵源、寫作手法和文體特徵看，行傳都是一種獨立的著述體式，在寫法、風格上都有著自身的獨立性，因此可說是漢魏六朝行記的兩種主要體式之一。

其次說到筆記體行記。之所以說筆記體也是一種獨立發展的行記體式，是因為它的文體特徵和寫法也具有很強的獨立性。筆記體行記的顯著特點就在於以無韻之筆行文，隨事記錄，不拘體例，一事一條，諸條之間互不關聯，似乎漫無中心，實則都服從各自的門目這一中心。這樣的特點使得作品內容上可以無所不包，既非一般傳記，也非地理專著，更非純文學著作，放在四部中的哪一個部類都顯得不合適。從《水經注》、《史記正義》、《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書中佚文看，上述行役記和交聘記在組織材料的時候，運用的正是這種隨事記錄、一事一條的筆記體。

上述特點在戴祚《宋武北征記》、《西征記》、郭緣生《述征記》、《續述征記》等書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唐宋古籍引戴氏書近百條，郭氏書八十餘條，引文在南北朝行記中最多。³³若將引文按照當時從軍征行路線由南到北依次排列，你會發現，作者一般是以自己的行跡為線索組織材料，先簡略交代行程，然後擇要記載山川風土、名勝古蹟。自淮泗西北至關中這一段記敘得最詳盡，舉凡沿途河流、關隘、城堡、古廟、要塞、古丘、墳墓、碑刻、古樹、溝谷、坡阪、館驛都有記載，保存了大量珍貴史料。交聘記如《封君義行記》、《魏聘使行記》則詳寫淮泗以南至建康這一南朝路段的經見，對於北朝本國境內的事物則略去不載。長期以來的分裂和對立，在南北文人間造成了空前的文化隔膜，也增添了瞭解對方的強烈興趣，因此就出現了北朝文人詳寫江南歷史地理文物，南朝文人詳寫中原秦漢舊境名勝古蹟的文化現象。郭緣生《述征記》中的眾多地名，如冶板城、泗水、廣固、齊桓公塚、函谷關、鴻門、秦梁、廣武城等，都在黃河流域、北魏境內，因此酈道元作《水經注》

³³ 這裡還只是說的載明了出處的，據查，《水經注》中另有不少文字，其實都出自郭、戴等晉宋文人之手，但多未注明來歷。

時，據以箋證黃河水系及沿岸重要地理景觀。此外如少室山袁術固、柏谷塢、白超壘、下坯城、嵩高山、中牟臺等都是漢魏遺跡、山川險要，多在河南山東境內。南朝文士入北，關注的重點就在這些方面。所記神話傳說尤多，從三皇五帝、許由、老子到漢晉諸帝，凡文武名臣遺烈事蹟，有聞必錄，記敘時往往實實虛虛，先實後虛。通常的寫法是先記敘一個景點的方位形勢，後附上一段相關的傳說。作者的好奇心重，揣其行文口氣，似不在於探究事實真偽，而在於搜奇志異。如《太平御覽》卷五八二引郭緣生《述征記》：「逢山在廣固南三十里，有祠并石人石鼓。齊世將亂，石人輒打鼓，聞數十里。」³⁴其實這應當只是廣固當地的民間傳說，未必與石人石鼓有關。《水經注》卷二四汶水注引《從征記》：「泰山有下、中、上三廟，牆闕嚴整。廟中柏樹夾兩階，大二十餘圍，蓋漢武所植也。赤眉嘗斫一樹，見血而止，今斧創猶存。」³⁵這條也見於《太山記》等書，可見也是當地流傳頗廣的傳說。《初學記》卷五引《述征記》：「華岳與首陽山本一山，河神巨靈析開為二。」³⁶這條據《水經注》和《搜神記》，原是漢魏以來就在華山一帶流傳的古語。這些內容的存在，使得此類行記閃爍著奇光異彩，反映了南北朝文人特有的通脫與好奇。這種風格特點，不但以前少見，此後也難逢，時代特徵格外顯著。

漢魏六朝是我國行記文學史上的初創期。此間形成的行記三類兩體，確立了我國古代行記的基本類型和體式，奠定了它的基本格局和發展方向。主要以行傳體寫成的外國行記，在經歷了漢魏六朝的初盛之後，至於唐五代，又迎來了它的全盛，無論作品數量、種類還是創作水準都超越前代，類別更多樣，內容更豐富。除先唐舊有的僧人求法行記

³⁴ 宋·李昉，《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五八二，頁2625。據《水經注》，卷二六，本條為郭緣生《續述征記》中文，《御覽》誤標出處。

³⁵ 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二四，頁580。

³⁶ 唐·徐堅，《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99。

外，又出現了唐人奉使西域南海記、域外僧人來華巡禮記、國內僧人遊方行記三個新類別；著作體式方面湧現出日記體的行程錄。至於宋元，這種行程錄蔚為大觀，成為行記著述體式的主流。但是物極必反，隨著佛教在宋代的衰微，晉唐時期長期流行、非常發達的僧人行記進入北宋就無可挽回地走向衰落。至於元明，取而代之的是大量記述中華士人出使外國的行記和文人國內行程記。然而無論時代如何變換，內容上却總未能越出先唐舊有的大範圍：或記中土僧俗的外國巡禮求法，或載中國文人的外國經歷和境內遊歷。即使從寫法上看，人們運用的多數也是先唐的那一套。凡此種種，無不見出漢魏六朝行記影響的深遠。

六、研究史之回溯與前瞻

漢魏六朝行記是一個複雜事物，其興起各有背景，內容各有側重，內部各有流別。作者的身份才性、行經地域、出使目的各異，牽涉面極廣，自難對其研究史做全面細緻的概括。縱觀魏晉以來迄今的行記研究，會發現，其採用和研究大體分四派：一曰改編派，由六朝隋唐學者採作史料，適當改寫，編入正史外國傳、地理志、風土記、僧人傳記、通代政書或目錄學著作當中，以酈道元、杜佑及晉唐正史編撰者為代表。二曰摘錄派，經六朝唐宋文人之手摘錄，編入類書、筆記小說、野史雜著當中，以虞世南、歐陽詢、徐堅、李昉等唐宋類書編者為代表。三曰考據派，由明清近代學者用作史料，箋證各體著作，論證某個專門問題，或對著作本身做精細專深的校勘注釋疏證，以王國維、伯希和、沙畹、長澤和俊、馮承鈞、岑仲勉、張政烺、季羨林、范祥雍、章巽等為代表。四曰研究派，由近現代學者按照當今的學術分工做文學本位研究或跨學科研究，以陳左高、王立群、韓兆琦、李祥年、郭少棠等為代表。無論哪一流派都各有所造，但亦不無欠缺。表現最顯著的就是，文獻層面的整理研究都是把它當做一種史料，文學研究則只把它當做一類

著述，認為不是文學，於是改從文學性眼光出發，注重發掘它的文學性，多持現代西方文藝觀念，從遊記、傳記、日記、筆記角度入手，從未將它當成一種有獨立價值的文體對待，在文獻層面因此只能是各取所需，割裂原作，不見全體，文學分析上各說各話，出發點不同，看法各異，很難取得一致意見。這種局面如果不儘早結束，聽其延續，那我們的行記研究就將始終難有突破。而若轉變觀念，改從文體學角度出發，將其當作一種古已有之的文體和文類對待，那就可能出現轉機。這樣，我們看到的就會是全時全體，而不是一時一體，或是一篇文章中文學性較強的一段話，它在文類上就有獨立價值，在文學研究領域就可佔一席之地了。具體的操作上，似應首先樹立全局眼光，做整體的學術觀照，明其倫類，辨其流別，然後從文獻學層面，對其做竭澤而漁的窮盡式搜括，以目錄學的功夫開路，由此入手，找出所能找到的全部作品，做輯佚、校勘、考釋、編目、著錄等細部工作，給大家提供盡可能全面、信實的研究文本和參考資料，這樣，研究就有了堅實的基礎。然後再組織人力開展文學本位研究，分工協作，集體攻關，各探一路，時相切磋，待以時日，我們的古行記研究定能取得明顯的進展，使人耳目一新！

Discussion on Three Kinds and Two Types of the Travel Notes by Writers in Han Wei and the Six Dynasties

De-Hui Li*

Abstract

Travel notes were a kind of historical work and prose. This literary form originated from the Han and Wei dynasty, popular from the Six and Sui Tang dynasty to Ming and Qing dynasty. Many authors and varieties emerged in a period of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Han and Wei dynasty, the basic study about this form is rather poor. As a result, we do not know how many types or forms existed in this period or how it was done. We must gain a clear idea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ravel notes. This thesis will answer those questions. According to their content, we differentiate between three types: foreign country notes, route notes and diplomatic travels, each with its own feature and writing technique. According to fashion, we classify those works into two kinds: travel biographies and travel notes. We will draw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two types on the following passage and discuss their basic writing features and patterns of evolution.

Keywords: Han Wei and the Six Dynasties, travel notes, classification, travel biographies, travel notes

*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e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